

人民日报发文分析“我们为何不愿花钱”，文章认为原因在于—— 缺少花钱“底气”，没钱花、不敢花

不花钱，就是不花——“扩大消费”说了这么久，今年一季度的各项数据显示：多数老百姓还是不“配合”。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后首次回升，但消费意愿仍处于较低历史水平。

央行对全国50个城市的储户调查更不乐观，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及储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创下了十年来的最低值。

越来越富裕为何越来越不敢花钱？越提倡消费怎么越不愿消费？说到底，还是制约消费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加剧的倾向。

花不花钱，先要看钱包做不做主。单看统计数据，过去几年，劳动者工资远比CPI“跑得快”，但仔细分析，多年来统计部门监测的主要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职工等。直到2010年，我国才首次发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工资状况，这部分劳动者平均工资2009年为18199元，一个月约为

1500元，仅相当于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55.6%，相当于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51.9%。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有钱人也不少，一出手就是LV、拉菲。但总体上看，这毕竟是少数，真正的消费主力是大量中低收入者，而这部分人工资绝对水平还偏低，消费能力没有根本性提升。月工资2000元左右，再怎么想扩大消费，又能有多大余地？就算今后快马加鞭，一年涨15%，也多出300元，其消费状况又怎么会有大的改变？

花不花钱，还要看老百姓未来的支出风险有多大。从幼儿园起就可能要交赞助费，上指定的培训班，大学收费一年年看涨，有机构测算，目前我国中等城市居民培育一个大学生至少要付出20万元的成本，谁家能不攒点钱？工作不好找、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更难找，一想到孩子将来可能要无奈“啃老”，工薪阶层的父母，谁敢敞开来花钱？看病最让人害怕，就算有医保，万一家里有人得了大病，还是吃不消。“人生莫受老来贫”，某经济学家“没有500万元存款

无法养老”的标准不敢奢望，但谁都希望退休后生活质量不要有明显下降，较高的通胀预期和不够“给力”的保障水平，让普通人只能选择尽可能地多存钱。至于房子，虽然在统计上不列入消费范畴，却实实在在地占去收入的一大块、挤压着消费……

有经济学家测算，如果按GDP支出法测算，过去10多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并不低，始终保持在8%以上，与GDP增速大致相当。之所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关键在于人们的消费过分集中于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硬性的、强制性的方面，其他消费欲望被压抑或者吞噬掉了。

为何总是不花钱？有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老问题——缺少花钱的“底气”，没钱花、不敢花。如果说，刺激消费是从老百姓那里“取”，那么解决这些制约消费的根本性问题就要“予”，实实在在地通过增加民生投入提高收入水平、化解后顾之忧。否则，只靠以旧换新、家电下乡等刺激性政策，恐怕效果有限，消费也很难真正走出低谷。

人民日报

对话

就相关话题，快报记者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系主任周凯博士进行了对话。

现代快报：人民日报的文章发问：越来越富裕为何越来越不敢花钱？越提倡消费怎么越不愿消费？你能总结一下原因吗？

周凯：就“手持货币多，但是不敢消费”的现象来说，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个人的工资性收入和总体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在高速增长的财政体系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善。在美国，它的经济增长率在3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它有一整套完整的保障体系，包括医疗、教育、福利等。和它的国民相比，我们需要消费的地方多得多，特别是承受着“三座大山”的压力。第二，国内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信心不足，因为我们没有很充分的、可以过人均保障线的失业保险，如果生了大病，虽然有医疗统筹，但仅仅是杯水车薪。第三，从教育角度来说，存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很多家长越是觉得窘迫，觉得财富积累的不够，就越是希望下一代能有好的收入，而要取得好的收入首先要受到优质的教育，因此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比拼，而这又意味着大笔的资金投入。第四，随着CPI的增长和通胀预期的加深，不消费的话货币可能在缩水，但是，如果消费，我就可能面临更多的被透支的未来预期项目，就会更加举步无措。这就是大量的资

金进入房产、基金的原因：希望起码有一个投资产品能让钱保值。不仅是有钱人，一般的居民有点常识的都会这么做。还有，现在人们对于一些税种还很疑惑，比如说遗产税、房产税等，税或费层出不穷，会让人产生少点消费、多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的意识。此外，失业率的走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动荡的、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你让人们把有限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

现代快报：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几年前，“消费即爱国”的说法引起较大争议。

周凯：消费即爱国？那储蓄就不是爱国吗？这只是一种应景式的口号，在今天越发显示出荒谬性。提出这样口号的人没有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

现代快报：在当下，如何通过具体措施来提振老百姓的消费信心呢？

周凯：那就要把“三座大山”逐步搬走。而且要做到，一个人即使没工作，他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对房价的总体水平要控制好，房子的租售比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等等。

现代快报：要想老百姓敢消费，控制好物价恐怕也是一个关键。

周凯：是的，看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仅仅看GDP提升得多快，更要看GDP提升的同时，能把物价降到多低。
快报记者 刘方志

语录



为何总是不花钱？有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老问题——缺少花钱的‘底气’，没钱花、不敢花。”

今日视点

市长怎么会知道赵本山要迫降？

赵本山的商务包机遭遇恶劣天气，降落在湖南常德机场。常德市长陈文浩等赶到机场迎接看望，受到网友质疑。常德官方回应：“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并强调其利用的是个人休息时间。

(5月5日《山东商报》)

在此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那就是赵本山迫降的消息是怎么传到市长耳朵里的？按理说，飞机要迫降，只要给常德机场个信息就够了，怎么连什么人在飞机上都说得这么清楚？不但常德机场得到了这个“重要情报”，连市长也知道了，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情况下通知市长的，以及有什么必要通知市长？

一架飞机要迫降，机场的工作就是做好准备保障安全，但因

为是“赵本山的商务包机”，这个信息比飞机迫降本身重要多了，要不然市长也不一定来。这就让人怀疑，在整个飞机迫降的过程中，无论是机场总经理亲自坐镇指挥，还是市长等官员接机，都是围绕着“赵本山的包机”来的，果真如此的话，赵本山这个名字，事实上就成了在中国国土上畅行无阻的名片，这张名片上写着，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无形的社会权利。

在当今的社会上，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只要有了足够高的地位，就没有走不通的路，不知道赵本山算不算其中的一个。市长看望赵本山，让人感到不舒服，触动了公众敏感神经，甚至感到忧虑的，其实正是这一点。

在很多情形之下，世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崎岖不平的，但对

强者或精英人物来说，世界不但“是平的”，而且可以一览无余，还可以随处享受到大大超越一般公民的尊荣，竞争性的市场法则，无限制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市长机场看望赵本山，再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效果。赵本山要来迫降，常德机场除了考虑安全工作，竟然还考虑到了“礼遇”等工作，这真让人吃惊！常德市长“礼遇”赵本山，面对舆论的质疑，当地官方的回应是：赵本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化领军人物，而常德市正在打造文化名城，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这也就是说，金字塔底端的多数人，必须被迫向金字塔顶端的人莫名其妙地表达“尊敬”和“敬重”，这尤其令人

感受到其中的世俗与势利。

有人说，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了，说明我们社会进步了，比如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之间，是不同的价值，各有其独立的价值，不能互相取代。但赵本山迫降事件说明，在一些地方，这些价值其实是互相转化的，只要你占有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实现“通吃”。

市长不但去接赵本山了，而且把此举解释为“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并把满面笑容的合影公之于众，这就可见其不仅觉得该接，而且对此没有任何忌讳。

这种社会精英和各路“成功人士”处处受到超常规礼遇的现象，正是社会的某种病症的反映，也是民众至可忧虑的地方。
(张金岭)

热点纵论

应教育孩子站起来而不是跪下去

又见跪礼。这次下跪的是广东实验中学初中的学生。在五四青年节这天，该中学首创“青年礼”。经老师和家长委员会的讨论，“青年礼”采取“跪父母，接家书”的形式进行，理由是“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5月5日《新快报》)

广东东莞一幼儿园给老师行跪拜礼表示感谢；湖南娄底一中学教师向犯错学生下跪以期震撼和唤醒孩子。跪，成为不少学校的教育特色。

有家长和孩子因为跪礼而泪流满面，这恰恰说明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举行“青年礼”本意是好的，但拥抱或会比下跪更适用于现代社会父母与子女的交流。

跪文化中，有心甘情愿的崇敬与虔诚，也有难以言说的屈辱与无奈。广东实验中学的“青年礼”该如何举行，或许应该更多地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而非由老师和家长做决定。在独生子女精神孱弱成一大潜在社会问题的时候，家庭和学校应该时时想到如何让孩子站起来，而非挟感恩之名让他们跪下去。而让孩子“站起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撑是，必须让他们的内心拥有无处不在的平等意识，而父母也不应该以威权人格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现在在家长和孩子普遍缺乏朋友式相处的背景下，一个莫名其妙飞来的“跪礼”，不但在形式上拉开了家长和孩子的距离，也在心理上为亲子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家庭友好环境的营造，对于孩子的正常人格塑造至关重要，不注重平时的交流，以为一个“跪礼”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教育思维中不折不扣的偷懒。

既然是“青年礼”，就意味着学生告别少年时代进入思想更活跃的青年时期，这个时候最该做的是支持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决定，而非是用包括“跪礼”在内的旧式绳索把他们捆绑“乖孩子”定位上。
(韩浩月)

它山之石

跨省追捕“精神病人”徐武于法无据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

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

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

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原载5月5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